

国家与暴力：非洲二维安全观构建探析

朱伟东 洛紫恒

内容提要 学界通常以“各类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来描述非洲安全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安全问题的定义与分类标准，忽视了非洲安全的类型学研究。因此，需要通过继承与完善现有安全理论，建立一个针对非洲安全问题的新分类框架。基于国家—非国家参与、直接—间接暴力的非洲二维安全观，可以将非洲安全问题分为4类：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利用二维安全观考察非洲近年来的安全形势，发现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中，非洲国家与恐怖组织、地方分离武装以及反对派武装的暴力水平持续提升，其中与恐怖组织的冲突造成死亡人数最多且增幅最大；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造成平民死亡人数最多，其中恐怖组织是最主要的暴力来源；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冲突次生暴力，集中发生于刚果（金）东部、提格雷地区和乍得。针对以上问题，非洲国家需要在管控直接暴力的同时，注意降低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并积极施策改变“弱国家”状态，尽量减少无国家参与的暴力事件。

关键词 非洲二维安全观 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 直接暴力 间接暴力

作者简介 朱伟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101）；洛紫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非洲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陆，其安全问题类型丰富且相互交织，给安全研究带来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成为检验安全理论价值的“试金石”。对非洲安全问题进行分类，有助于从混乱、复杂且庞大的安全现象中进一步提炼规律，以便更

客观地理解非洲安全问题，并为实现和平创造条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非洲安全问题主要有3种分类方法：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分类、直接—间接暴力理论分类以及问题域分类。

按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分类的学者有罗建波、徐伟忠、马克·帕特森 (Mark Paterson)^①、尼尔·马文 (Neil Melvin)^② 等人，但他们在进行这种分类的同时又提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不能完全区别，甚至存在相互交融的现象。

按直接—间接暴力理论分类的学者代表是约翰·加尔通 (Johan Galtung)^③，但其理论存在一定缺陷，还不能直接用于分析非洲安全问题。张春通过改良该理论，尝试对非洲安全问题进行区分，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其中的逻辑问题，导致分类标准不明确。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尽管没有明确表示运用该理论，但是在成果中体现了相似的分类思路。比如洛伊德·弗戈曼 (Lloyd Vogelmann) 等人将南非针对女性的暴力归因为社会结构不平等，^④ 奥斯丁·罗兰德森 (Oystein Rolandsen) 认为一些东非国家的暴力事件源于对国家权力结构的维护。这些学者注意到，除直接暴力以外，还存在源于社会结构、国家体系的间接暴力，但他们都没有进一步阐述两种暴力形式的界限和关系，因此该理论仍需进一步完善。

按问题域分类的学者很多，而且分类标准不统一，但其中的问题大致相似。比如，王洪一从政治、军事、恐怖主义、治安等领域分析非洲安全，但是主要讨论涉及武力性质的暴力，忽视了由社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间接暴力。在论述非洲不安全的原因时，他认为部分间接暴力如经济压迫、货币管制引发非洲的武装暴力，却没有详细说明两者作用的过程和逻辑。^⑤ 再如，张凯通过国家内部冲突、军事政变、气候变异、恐怖主义4个方面描述非洲的安全情况。^⑥ 其安全分类领域有所不同，但也忽视了间接暴力形式并模糊了各暴力类型间的区别与关系。

综合以上对3种分类方式的简要分析，可以得出3点启示。首先，按问题域分类的方法尚无统一的划分标准，而且目前学界对其鲜有理论性探讨。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现有理论上尝试建立一个学理性的非洲安全问题分类理论，那

① Mark Paterson and Kudrat Virk, "Africa and the Reform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enter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3, p. 12.

② Neil Melvin, "The New External Security Politics of The Horn of Africa Region," *SIPRI Insights on Peace and Security*, No. 2019/2, 2019, p. 32.

③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 No. 3, 1969, pp. 167 - 191.

④ Lloyd Vogelmann and Gillian Eagle, "Overcoming Endem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South Africa," *Social Justice*, Vol. 18, No. 1/2, 1991, pp. 209 - 229.

⑤ 王洪一：《非洲安全新挑战及其对中非合作的影响》，《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9期，第39页。

⑥ 张凯：《非洲地区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0期，第18页。

么问题域分类方法对本文的意义不大,故不作深入分析。其次,有关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和直接—间接暴力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以这两大理论为基础的分类运用也比较成熟。分析评价两大理论的内涵以及对非洲安全问题分类的效果,有助于为构建新的非洲安全理论提供经验。最后,相较于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直接—间接暴力理论更容易改良。安全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和平与暴力两个方面,构建安全理论要求解释涉及和平与暴力两个方面的概念,因此涵盖面较广,内容复杂。作为安全理论研究的核心部分,暴力理论的研究范围相对较小,有争议的概念也较少,所以可以从暴力研究入手阐释安全问题。此外,直接—间接暴力理论在暴力研究的基础上关联了和平理论,避免了纯暴力研究的片面性。因此,本文尝试分析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和直接—间接暴力理论在安全问题分类中的不足,并借此改良直接—间接暴力理论,试图达到全面明确地对非洲安全问题进行分类的目的。

现有安全观分析非洲安全问题的局限性

现有安全观是指过去安全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的总和。这些理论与方法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五百年,包括孔子的“协和万邦”思想,以及柏拉图《理想国》中由 3 个社会阶级组成国家的构想。这一时期的安全观被称为“古典安全战略思维”^①,其主要形成于学者们对政治统治的探讨,对于“什么是安全”“保护谁的安全”“如何实现安全”等基础性问题少有专门著述。直到民族国家诞生,现代国家安全概念以及安全研究的轮廓才逐渐清晰,出现了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并成为安全研究的主流范式。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程度加深,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趋于多元化、复杂化,以国家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安全观及其安全维护手段暴露出严重缺陷,而聚焦于贫困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等低政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理论不断凸显,把安全分为“传统”与“非传统”成为安全理论发展史上的标志。^②被称为“和平学之父”的约翰·加尔通提出了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理论,将暴力划分为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两种类型。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并广泛用于分类描述、分析安全问题。作为安全问题分类的主要理论工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理论、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理论各有优势,但是在分析非洲的安全问题时两者都存在局限,不能作为考察非洲安全问题的理论工具。

① 刘强、钮汉章主编:《国际安全战略思维史纲》,时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5 页。

②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 页。

（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理论在分析非洲安全问题中的局限性

传统的安全研究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假设和推论为基础，主要包含 5 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第二，国家安全是保卫国家领土、边界不受到侵犯；第三，国家安全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和政权组织；第四，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主权不受威胁；第五，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而非主观感到安全受威胁。^① 总体而言，传统的安全研究将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战略安全，忽视了国内的威胁和非军事因素，过分关注军事工具的作用，导致过分强调国家安全的军事内容，而对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非军事内容的关注相对较少。^②

冷战结束后，影响安全的非国家因素、非军事化因素逐渐增多，安全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化、社会化和人道化趋势，并相应出现了人权安全、全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概念。^③ 此后，传统—非传统成为安全问题研究的最主要维度之一，大多数学者都将安全问题分为传统、非传统两类进行研究。但是，目前非传统安全还不是一个非常清晰、有公认定义边界的概念。^④ 通过对比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基本内涵，可以大致勾勒出非传统安全的界限，二者的区别主要分为 4 个方面（见表 1）。第一，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互动或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则主要指向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⑤ 第二，传统安全研究的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安全互动，并把国家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着重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安全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跨国贩毒和人口走私以及煽动暴力和反人类的邪教组织活动等。^⑥ 第三，传统安全研究侧重安全议题中的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则研究非军事安全对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影响。^⑦ 第四，传统安全致力于保障主权、领土和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国家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则将重点转向超越国家差异的社会和人的安全，以人类维持日常生活、价值和免于匮乏、天灾以及专制迫害为最基本的内容和目的。^⑧ 总体而言，

① 刘胜湘：《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欧洲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3 页。

② 李学保：《当代国际安全合作的探索与争鸣》，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 页。

③ 李学保：《当代国际安全合作的探索与争鸣》，第 32 页。

④ 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第 139 页。

⑤ Michael E. Brow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

⑥ 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第 139 页。

⑦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enn State Press, 1995, p. 96.

⑧ Steve Smith, “Mature Anarchy, Strong States and Security,” *Arms Control*, Vol. 12, No. 2, 1991, pp. 325 – 329.

与传统安全问题相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点是多国或多层次行为体参与的涉及社会和人的非军事安全问题。

表 1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别

	研究对象	威胁来源	安全议题	安全的标准
传统安全问题	国家行为体	国家行为体	军事安全	国家安全
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国家行为体	非国家行为体	非军事安全	人和社会安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虽然有很多学者借助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对安全问题进行分类研究，但实际上，一些和平与安全问题，特别是非洲安全问题很难分清属于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具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① 比如，非洲的跨界民族问题，既有可能成为政治军事方面的传统安全威胁，又可以被塑造为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威胁。^② 再如，2012 年 3 月马里危机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的典型。一方面，马里危机包含了传统的部族矛盾、宗教冲突、分裂主义、外部势力的直接军事干涉等；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在马里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③ 因此，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并存的情况下，单纯以传统—非传统安全理论进行分类缺乏合理性。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安全概念模糊。在一些学者看来，安全并没有明确定义，如布赞（Barry Buzan）、弗雷（Daniel Frei）、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人甚至否认“安全”有确切的含义，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模糊的象征。^④ 还有学者认为，“安全只是思想的外皮，它所应用的时间和环境不同，它的色彩和内容就可能截然不同。”^⑤ 传统—非传统安全概念建立在安全概念之上，因而安全概念模糊会导致传统—非传统安全概念难以界定。比如，刘跃进曾提到，“有些人认为历史上早已存在的要素应属于传统安全，如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而有些人认为这些要素只有在今天的非传统安全观中才受到重视，因而是非传统安全要素。”^⑥ 这个例子可以引出两个问题：一是安全研究的对象是谁？换句话说，研究谁的安全？如果国民、经济、社会、资源

① 张春宇、张梦颖：《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9 页。
② 胡洋、[尼日利亚] 拉希德·奥拉吉德：《行为体视角下非洲跨界族群的安全问题初探》，《世界民族》2021 年第 4 期，第 112 页。
③ 贺文萍：《非洲安全形势特点及中非安全合作新视角》，《亚非纵横》2015 年第 2 期，第 14 页。
④ Peter Mangol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utledge, 1990, p. 3.
⑤ Gregory D. Foster, *In Search of a Post – Cold War Security Structur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1994, p. 24.
⑥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 年第 6 期，第 11 页。

等领域都成为安全研究的对象，那么将导致安全研究的范畴无限扩大，最后变得无所不包。二是判定是否为安全问题的标准是“发生过”，还是“意识到”？换句话说，是否只有被感知到的威胁才算威胁？如果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建立在安全概念基础上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定义将继续处于模糊状态。

第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关系模糊。很多学者都认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关于如何联系的问题，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刘学成认为，“传统安全理论是安全的内涵，非传统安全理论是实现安全的手段。”^①肯·布斯（Ken Booth）把非传统安全理论视作对传统安全理论的革命，进而提出“非传统安全应该将传统安全对军事层面的关注转向新的、非传统的社会、文化和认同层面的安全研究”^②。迈克尔·尼科尔森认为非传统安全是对安全研究的再定义，并提出“传统安全观念都是强调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后，新的、非传统安全观念应该强调让人民免受暴力的威胁”^③。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关系上的争论，意味着无法确定两个概念的解释范畴是否存在交集，因此也就不可能依此对安全问题进行分类，否则就会造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模糊局面。

第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界限的划分不明确。目前，学界普遍接受通过是否涉及军事来区分两者，即传统安全主要指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就是非军事安全。^④从现实角度讲，是否涉及军事无法划分两者界限。比如国际上普遍认为武器扩散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但从事武器扩散的主体可以是国家、组织或个人，而且武器扩散显然对国家安全造成军事威胁。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是非传统安全的领域中也会存在军事因素，以军事因素来划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界限可能会造成分类错误。

（二）直接与间接暴力理论在分析非洲安全问题中的局限性

作为安全研究的主要部分之一，暴力的性质和分类是一些学者探索战争与和平关系的逻辑起点。在有关暴力的研究成果中，约翰·加尔通的直接与间接暴力理论已成为对非洲安全问题分类的主要标准之一。

1969年，约翰·加尔通对“和平”一词的含义提出质疑，认为和平一词已

① 刘学成：《非传统安全的基本特性及其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第32页。

② Ken Booth, “Security in Anarchy: 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7, No. 3, 1991, pp. 527 – 545.

③ Michael Nichol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cise Introduction*, Red Globe Press London, 1998, p. 137.

④ 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第139页。

成为获得支持和共识的工具，任何政策都可以与实现和平有关，“这一现象虽然可以带来政治团结，但对于学术研究，概念的模糊性是致命的。”^① 于是，他尝试对和平的含义进行学理性分析，以“和平是暴力的缺席”作为前提假定，把对暴力的定义作为逻辑起点，构建了直接—间接暴力理论。

约翰·加尔通把暴力定义为：当人受到影响，以致躯体和精神的“实际水平”低于“潜在水平”时，则暴力存在。^② “实际水平”是暴力客体实际享有的躯体、精神利益水平；“潜在水平”是暴力客体应该享有的躯体、精神利益水平。暴力存在的依据就是“实际水平”小于“潜在水平”；反之，“实际水平”大于或等于“潜在水平”则暴力不存在。根据施暴主体，暴力可分为两类：一是行为体直接实施暴力，即直接暴力；二是没有行为体直接实施暴力，即间接暴力。两类暴力中，约翰·加尔通重点解释了间接暴力，认为间接暴力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社会不公，如自然资源分配不均、收入分配不均、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通过例子可以说明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的区别：假设某人在不应挨饿的情况下面临饥饿，由于他的“实际水平”低于“潜在水平”，所以可以认定他正在遭受暴力。如果军事袭击导致他无法果腹，那么在该暴力中存在明显的施暴主体，所以依据相关定义可以确定他正遭受直接暴力。如果世界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他无法获得应得的食物，那么在该暴力中没有明确的施暴主体，所以可将此暴力定义为间接暴力。

约翰·加尔通认为，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世界上无时无刻不发生暴力，但在第一次枪杀、抢劫、袭击之前世界上依然存在一种暴力，那就是间接暴力。”^③ 换言之，现有的直接暴力形式，如枪杀、抢劫、袭击，有可能由间接暴力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引起。但是，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的关系似乎仍不明确。既然前者可能由后者引起，那么如何确保两种暴力的独立性？对此，加尔通作出回应：第一，除主体外，区分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的另一标准是暴力发生的原因而非形式；第二，间接暴力与直接暴力都可以独立存在，并且在某些条件下“潜在的”直接暴力可以转化为间接暴力。

加尔通从“和平是暴力的缺失”这一假定出发，通过研究暴力的分类，推导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的定义，将人们的目光引向避免间接暴力与实现积极的和平，为暴力与和平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深入分析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的定义与区别，不难发现该理论还需进一步完善。

①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 No. 3, 1969, pp. 167 – 191.

②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pp. 167 – 191.

③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pp. 167 – 191.

首先，对于暴力的定义不够明确。加尔通在对暴力的定义中解释了什么是“实际水平”和“潜在水平”，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论证如何衡量“潜在水平”。如果不明确衡量“潜在水平”的标准，就无法确定是否存在暴力。比如，假设因自然灾害某国人民全体陷入饥荒，在此背景下，如果以该国人民的平均粮食占有量来衡量“潜在水平”，那么尽管人们正在挨饿，但并没有遭受暴力。这是因为，自然灾害极大地拉低了该国人民的平均粮食占有量，致使该国人民的“潜在水平”就是挨饿。所以当他们挨饿时，“实际水平”等于“潜在水平”，暴力并不存在。但是，如果以全世界人民的平均粮食占有量来衡量该国人民的“潜在水平”，面临饥荒的人一定遭受了暴力。

其次，间接暴力是否存在施暴主体？针对这一问题，加尔通的论述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认为间接暴力源自社会结构不合理、制度不公平，而社会结构和制度并不能被视作施暴主体，所以间接暴力没有施暴主体；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一些国家建立了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致使其他国家遭受间接暴力。如果前面的论述成立，那么后面论述中的国家就不能被视为施暴主体，但是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由国家建立的，这些国家不是施暴者又是什么呢？对于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暴力，国内有学者进行了一些研究，^①但许多相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例如，一些非洲国家，特别是在相对落后的非洲乡村地区存在残疾人受歧视现象，他们很难平等地接受教育、医疗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也很难找到工作。毫无疑问，残疾人受歧视属于间接暴力，而施暴者并不是国家。这些国家并没有倡导或鼓励歧视残疾人，相反还尝试通过立法保护残疾人的基本权利。针对残疾人的间接暴力主要来源于地区社会文化，一些人将残疾人视为“厄运的象征”，并拒绝与他们沟通或提供任何服务，所以施暴者可能是某个学校的老师、医院的护士或者商店的老板等个人或组织。由此可见，间接暴力的施暴主体也可以分为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两类。

再次，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的关系不明确。加尔通认为，等级制社会建立起来后，一定会运用“潜在的”直接暴力维护社会结构。简言之，在等级制社会中，掌权者会利用镇压、拘禁、逮捕等方式施行间接暴力。那么问题是，“潜在的”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是什么关系？前者是否会转化为后者？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就不能厘清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的概念边界。实际上，加尔通的区分标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实践中实施暴力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暴力往往并非由单一因素导致。比如某位男性对其妻子实施家暴，直观地看家暴

① 张春：《非结构性暴力增生与非洲动荡的常态化》，《当代世界》2014年第9期，第44—46页。

是由男性实施的直接暴力，但是家暴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家暴也可以被视为间接暴力。

总之，基于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理论、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理论的论述与评价，不难发现两者都无法清晰明确地区分当前非洲存在的安全问题。因此，笔者尝试构建非洲二维安全观，完善非洲安全问题的分类，进而深化非洲安全问题研究。

非洲二维安全观的界定及内涵

本文所称的二维安全观是指以国家参与情况和暴力类型作为考察非洲安全的两个维度，通过二者的排列组合划分非洲安全类型的一种方法。

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间接暴力，都存在两类施暴主体即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据此可以推理出四种组合（见图 1）。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可以解释为“施暴者或暴力受体中至少有一方为国家的武装暴力”；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是“施暴者或暴力受体中都没有国家行为体的武装暴力”；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为“施暴者或暴力受体中至少有一方为国家的非武装暴力”；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为“施暴者或暴力受体中都没有国家行为体的非武装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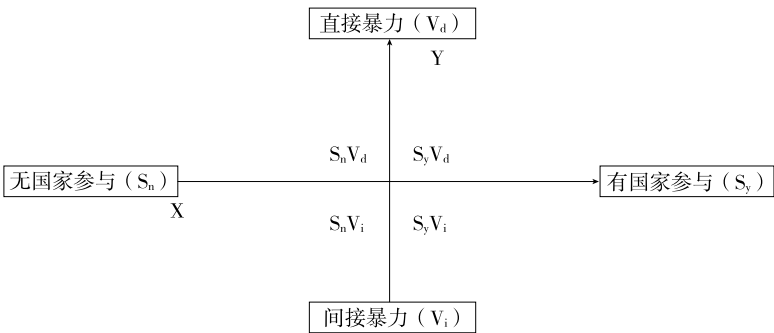


图 1 非洲安全问题分类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首先，直接与间接暴力的区别包括施暴形式、稳定性和伤害程度。第一，直接暴力的施暴形式是直接使用武力，而间接暴力是源于不公平社会结构的非武力施暴。第二，间接暴力的稳定性高于直接暴力。^① 第三，一般而言，短期内直接暴力对受体的伤害程度高于间接暴力；而间接暴力对受体的伤害主要是阻碍其获

①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pp. 167 – 191.

取资源或剥夺其获取资源的能力。比如，当某一集团或阶级垄断了资源并用于利己时，其他人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就被削弱。相较于间接暴力，直接暴力不仅可以迅速剥夺受体获取资源的能力，还会摧毁其自保的能力，甚至直接消灭受体。因此，从短期来看直接暴力可能会对受体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但是从长期来看则很难确定哪种暴力的伤害程度更高。以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灾难和伤害为例，殖民主义既有直接暴力——坚船利炮、武力镇压和残酷刑罚等，也有间接暴力——经济剥削、文化侵略、思想控制等。在非洲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之后，殖民主义的直接暴力统治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其全方位的间接暴力危害依然长期存在。“殖民主义给非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是非洲大陆至今仍然贫穷落后的根源。”^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间接暴力的危害持续更久远，影响更广泛。

其次，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可以同时存在。虽然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本质上是相互区别的，但是施暴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同时运用两者。比如，在战争时某国既可以通过武力直接打击对方，也可以通过贸易制裁、能源制裁等间接方式削弱对方获得资源的能力。再如，统治者一方面塑造了一系列有利于权力统治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命令武装部队镇压反抗者。前者没有使用武力，是间接暴力，而后者使用了武力，是直接暴力，两种暴力同时存在。对非洲国家而言，一方面它们长期遭受外部干预，深受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害，难以完全实现自主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各国普遍存在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宗教争端、党派矛盾等，政权更迭、政局动荡时有发生，各种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彼此交织，使国家稳定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再次，有无国家参与的暴力在性质上存在差别。国内系统不是自助体系，公共机构必须为公民安全负责。^②有效的政府垄断了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即公共机构被组织起来，以防止和对抗私自使用武力。因此，当一国范围内出现暴力时，政府应发挥社会管理职能消灭暴力。比如，当非正式武装团体间爆发冲突时，为避免冲突升级，政府应积极介入，改变无国家参与的状态，从而管控冲突和暴力。然而，由于一些非洲国家缺乏治理能力和意愿，产生了大量无国家参与的暴力，即“弱国家”现象。弱国家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管理国内社会，实现民族国家内部和平。^③在前殖民时代，非洲就已存在弱国家现象。因为没有明确的国家边界，距离首都较远的族群同时效忠于多个政治领导人，所

① 吴传华、贺杨、卫白鸽：《习近平新时代中非合作观：时代背景、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西亚非洲》2022年第5期，第71页。

② [美]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③ 卢静、曲博主编：《当前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220页。

以中央政府难以治理这些流动性极高的人口。殖民时期，殖民者不顾非洲实际情况划定了非洲的“主观边界”，导致辐射能力有限、治理水平不足的非洲国家政府难以有效管理领土，出现了很多政府治理边缘地区，为无国家参与的暴力提供了土壤。随着非洲国家实现独立，以及非洲一体化水平提高，政府治理边缘地区已逐渐减少，但是一些非洲国家治理水平仍有待提升，并且殖民时期遗留的政治机构虚弱、跨界民族等问题加剧了非洲安全治理难度。因此，目前非洲“弱国家”现象仍然大量存在，管控“弱国家”导致的无国家参与的暴力迫在眉睫。

作为一种非洲安全问题分析框架，非洲二维安全观试图突破现有安全观的局限，尝试解决非洲安全问题分类存在的概念边界模糊、解释力度不足及研究对象不明确的问题，从而为非洲安全问题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为非洲安全问题解决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非洲二维安全观的实践验证

本部分将运用非洲二维安全观分析近年来非洲安全形势与发展趋势。首先，依据有无国家参与和有无使用武力两个维度将非洲发生的暴力事件分为 4 个类型，即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其次，通过统计死亡人数，评估直接暴力的危害程度及发展趋势；根据媒体报道情况，总结影响力较大的间接暴力事件并分析此类暴力的发展趋势。再次，分别评价非洲 4 种暴力类型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并尝试给出应对之策。

（一）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统计，非洲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数量远高于其他大洲。2021 年非洲共发生了 40 起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事件，而其他大洲均不超过 20 起。这 40 起暴力事件涉及 21 个国家，其中有 4 个国家（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在此类暴力中连续 3 年（2019—2021 年）死亡人数低于 50 人，因为影响较小而不作重点分析。^①在其余 17 个国家中，有 8 个国家近年因此类暴力事件死亡人数飙升（见表 2）。这些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事件大体分为 3 类。

^①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https://ucdp.uu.se/>, accessed March 1, 2023.

表 2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死亡人数 (单位：人)

	布基纳法索	中非共和国	乍得	刚果（金）	埃塞俄比亚	马里	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
2019	532	63	146	875	146	603	292	1352
2020	687	81	196	1312	3563	806	1047	2044
2021	1016	951	487	1163	11822	766	736	2018

资料来源：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https://ucdp.uu.se/>,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第一，国家与恐怖组织间冲突主要集中在萨赫勒地区，死亡人数增幅最大。近年来，与有关国家直接冲突较多的恐怖组织为“伊斯兰国”（ISIS）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NIM）。首先，大规模反恐行动已大幅削弱了萨赫勒地区“伊斯兰国”的力量，但其依然是该地区最活跃的恐怖组织，并持续与多国政府军爆发激烈冲突。2020 年，尼日尔共有 514 人死于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主要是“伊斯兰国”与尼日尔政府军的冲突。同年，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的此类暴力事件急剧增加，莫桑比克政府军与“伊斯兰国”的冲突造成 937 人死亡，同比增长 3.82 倍。后来在非洲国家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合作打击下，“伊斯兰国”在非洲已基本丧失大规模进攻能力。其次，布基纳法索政府、马里政府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仅 2021 年，布基纳法索政府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冲突就造成 836 人死亡。同时，虽然马里政府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冲突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较少，但数量仍在上升，2019—2021 年平均增长率高于 20%。

第二，中央政府与地方分离主义武装之间的冲突集中发生于个别地区，如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地区、安哥拉的卡宾达地区。在提格雷地区，自 2020 年 11 月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与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间的冲突爆发后，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导致死亡人数迅速增长，从 2020 年的 1596 人增至 2021 年的 8787 人，提格雷冲突成为埃塞俄比亚动荡的主要原因。2022 年 11 月，提格雷武装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在安哥拉卡宾达地区，卡宾达飞地解放阵线—蒂亚戈·恩齐塔派（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Enclave of Cabinda – Tiago Nzita faction, FLEC – FAC – TN）在 2019—2020 年较为活跃，与安哥拉政府的冲突共造成超过 50 人死亡。由于数据缺失，2021 年该分离组织的活动状况暂不清楚，但从安哥拉政府多次进攻与刚果（金）的交界地区可以判断，该组织依然活跃。

第三，与以上两类冲突相比，政府与反政府武装间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较少，但延续时间更长。此类冲突集中爆发于刚果（金）、乍得以及中非共和国。刚果（金）有 3 类地方武装团体比较活跃，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包括玛伊—玛伊民兵团体、M23 反叛组织、变革运动集体（Collective of Movements for Change, CMC）。玛伊—玛伊民兵团体主要指以社区为基础的民兵团体，其中相对活跃的

武装组织有争取自由和主权刚果爱国联盟 (The Alliance of Patriots for a Free and Sovereign Congo, APCLS)、刚果人民争取主权全国联盟 (National Coalition of the People for the Sovereignty of Congo, CNPSC)。2019—2021 年, 这两大武装组织与刚果 (金) 政府爆发了多场冲突, 共造成 447 人死亡。但到后来, 争取自由和主权刚果爱国联盟转而与政府进行合作, 共同打击 M23 反叛组织。2021 年 11 月, M23 反叛组织发动大规模袭击, 占领了多个边境城市。2022 年 11 月, 在东非共同体的调解下, M23 反叛组织与刚果 (金) 政府达成《罗安达停火协议》, 但双方能否遵守该协议还需继续观察。变革运动集体是由胡图族中恩雅图拉 (Nyatura) 派别组建的联盟武装, 2019—2021 年该武装派别与刚果 (金) 政府的冲突共造成两百多人死亡。

在乍得, 反叛组织拯救共和国军事指挥委员会 (Military Command Council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Republic, CCMSR) 与乍得变革与和谐阵线 (Front for Change and Concord in Chad, FACT) 相互支持, 力图推翻乍得政府。2021 年 4 月, 乍得变革与和谐阵线在乍得总统选举当天发动突然袭击, 与政府军在卡奈姆地区爆发激烈冲突, 导致 300 名叛军和 25 名政府军死亡, 时任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因受重伤身亡。

在中非共和国, 6 个反叛组织于 2020 年 12 月宣布团结在中非共和国和平联盟 (Union for Peace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UPC) 的旗帜下。^① 2021 年, 中非共和国政府军与叛军之间的冲突共导致 900 多人死亡。

在其余 9 个国家中, 利比亚、埃及和苏丹因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死亡人数明显下降 (见图 2)。利比亚呈现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交战双方于 2020 年 10 月签署了《利比亚所有地区永久停火协议》, 这被称为“利比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转折点”^②。埃及则主要得益于近几年的反恐行动, 自“西奈行动 2018”之后, 埃及政府多次组织针对“伊斯兰国”的大型攻势。2020 年, 西奈半岛部落武装加入政府军进一步增强了埃及的反恐力量。到 2021 年, “伊斯兰国”在该地区的实力大幅减弱, 与埃及政府间的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 2019 年以来的最低点。

苏丹军事政变结束是造成此类暴力死亡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2018 年末苏

① 6 个反叛组织分别是: 中非共和国和平联盟 (Union for Peace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中非共和国爱国运动 (Patriotic Movement for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中非共和国文艺复兴人民阵线 (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Renaissance of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反巴拉卡姆卡姆 (anti-Balaka Mokom)、反巴拉卡恩噶索呐 (anti-Balaka Ngaissona)。

② “Libyan Civil War 2020,” Global Securit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libya-civil-war-2020.html>, accessed March 5, 2023.

丹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巴希尔政府强行镇压。2019 年 2 月，苏丹部分高级将领及普通官兵倒戈，组织发动军事政变。2019 年 4 月，巴希尔政府被推翻，苏丹进入政治转型期。同年 8 月，苏丹各派政治力量达成《政治和宪法宣言》(The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Declarations)，建立了过渡期主权委员会，并与部分反对派武装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签署了最终和平协议，即《朱巴和平协议》。^①苏丹国内政治局势趋稳，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事件大幅下降。但是在 2021 年 10 月，苏丹军方扣押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等反对党派官员，解散过渡权力机构，引起大规模反抗，导致 2021 年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死亡人数有所回升。由于苏丹各政治力量间的利益分歧，该国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发展趋势尚不明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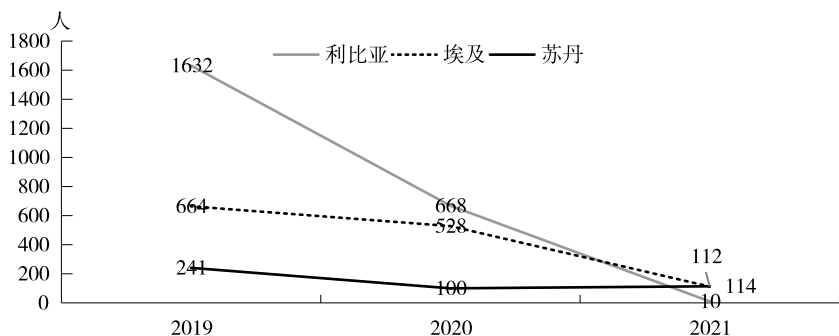


图 2 2019—2021 年利比亚、埃及、苏丹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https://ucdp.uu.se/>, accessed February 20, 2023.

其余 6 个国家死亡人数在 2019—2021 年内保持平稳，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索马里。索马里“青年党”在该地区十分活跃，经常对政治目标进行自杀式袭击。

2019—2020 年，索马里“青年党”与政府之间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 1910 人和 1901 人。自 2020 年 12 月美国从索马里撤出 700 名美军，同时减少了对索马里“青年党”的空袭后，2021 年索马里“青年党”与政府之间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有小幅上升，达 2119 人。2022 年索马里“青年党”更加活跃，发动多次爆炸式袭击。^② 为应对这一不安全形势，美国加强了对索马里“青年党”的空袭，^③

- ① 涂龙德：《苏丹过渡期政治转型的三大趋势述评》，《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155—156 页。
- ② 《索马里发生两起爆炸袭击至少 48 人死亡》，https://world.gmw.cn/2022-03/25/content_35612062.htm，访问时间：2023 年 3 月 5 日；《索马里首都一酒店遭恐袭致 21 人死亡 117 人受伤》，http://www.news.cn/world/2022-08/21/c_1128933752.htm，访问时间：2023 年 3 月 5 日；《索马里首都两起爆炸袭击已致 100 人死亡》，http://www.news.cn/world/2022-10/30/c_1129088534.htm，访问时间：2022 年 3 月 5 日。
- ③ “US Air Strikes in Somalia up 30 percent in 2022”，<https://shabellemedia.com/us-air-strikes-in-somalia-up-30-percent-in-2022/>，访问时间：2023 年 3 月 10 日。

索马里政府也宣布对“青年党”发起“全面战争”。目前，索马里“青年党”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已从多地撤出。^①

(二) 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见表 3），从这个角度讲，前者的安全威胁更大。但实际上，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往往更多，比如 2021 年布基纳法索无国家参与的暴力造成 429 人死亡，其中平民 347 人；而有国家参与的暴力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仅为 10 人。再如 2021 年中非共和国无国家参与的暴力造成 129 人死亡，全部为平民；而有国家参与的暴力造成 951 人死亡，其中平民 25 人。可见，平民是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表 3 2019—2021 年非洲两类直接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对比 （单位：人）

年份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8000	11000	19000
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	3000	3700	3700

资料来源：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https://ucdp.uu.se/>,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3.

2019—2021 年，共有 22 个非洲国家存在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其中有 7 个国家（布隆迪、埃及、吉布提、几内亚、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每年死亡人数低于 50 人。其余 15 个国家中大致存在 3 种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恐怖组织间及其对平民的暴力、民族冲突、反政府组织间冲突。

第一，恐怖组织间及其对平民的暴力造成死亡人数最多。自 2014 年“伊斯兰国”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并自立门户后，不断谋求自身扩张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基地”组织形成战略竞争态势。^② 这种竞争在非洲主要表现为两大恐怖组织分支间的冲突与博弈。2019 年以前，萨赫勒地区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GS）^③与效忠“基地”组织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保持非常微妙的关系，曾被称为“萨赫勒例外”。“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效忠“基地”组织时曾多次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并肩作战，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战斗友谊”。与其他“伊斯兰国”分支和“基地”组织分支间针锋相对的关系不同，

① Mohamed Olad Hassan, “Somalia: al-Shabab’s Grip on Somalia Loosening,”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2301290067.html>, accessed March 10, 2023.
② 刘乐：《“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探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9 页。
③ 该组织曾属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分支，从中分裂后效忠于“伊斯兰国”西非省，因此该组织既与“基地”组织保持密切关系，又向“伊斯兰国”效忠。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加入“伊斯兰国”之后，一直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保持较为和平的关系。但在2019—2021年，两组织因争夺势力范围在马里、布基纳法索等萨赫勒地区爆发多次冲突，共造成504人死亡。

此外，“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还通过恐怖袭击制造恐怖效应，并以此提升声誉。^①尤其是“伊斯兰国”宣称，“通过暴力重新清洗已经被异化的伊斯兰世界。”^②该组织在非洲发动的恐怖袭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亡，2019—2021年死亡人数分别为954人、2235人和2494人。2019年以后，“伊斯兰国”势力扩展至刚果（金）和莫桑比克。2019—2021年，刚果（金）是“伊斯兰国”杀害平民最多的国家，尤其是在2019年7月刚果（金）“民主力量联盟”（Alliance of Democratic Forces, ADF）宣誓效忠“伊斯兰国”之后，针对平民的袭击陡然增加。据统计，2019—2021年“伊斯兰国”在刚果（金）共杀害平民2684人。

第二，尼日利亚、苏丹民族冲突逐渐升级。2019—2021年尼日利亚富拉尼人与多个民族爆发冲突（见表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富拉尼人爆发冲突的民族数量逐年减少，但死亡人数却在增加，这证明有些冲突的烈度上升。其中，富拉尼人与提夫人（Tiv）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2021年造成284人死亡，是2019年双方冲突死亡人数的20倍。2019—2021年，苏丹因不同民族之间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在连年增加（见表5）。

表4 尼日利亚富拉尼族与其他民族冲突情况

年份	2019	2020	2021
与富拉尼族爆发冲突的民族数量（个）	9	8	5
死亡人数（人）	242	313	460

资料来源：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https://ucdp.uu.se/>, accessed March 3, 2023.

表5 苏丹民族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单位：人）

	2019	2020	2021
马萨利特人—阿拉伯人	0	3	412
马萨利特人—富拉尼人	0	47	11
马萨利特人—马哈里亚人	0	84	0
努巴人—贝尼阿米尔人	85	83	57
努巴人—哈瓦兹马	0	0	26
富拉尼人—里扎伊人	242	40	70
富拉尼人—泰莎人	0	0	48

① 刘乐：《“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探析》，第33页。
② 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第158页。

(续表 5)

	2019	2020	2021
福拉人—尼维巴人	27	0	0
米赛里亚人—恩戈克丁卡人	14	51	14
米赛里亚人—阿拉伯人	0	0	85
苏丹解放运动努尔派— 苏丹解放运动米纳维派	67	201	0
总计	435	509	723

资料来源: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https://ucdp.uu.se/>, accessed March 6, 2023.

第三, 中非共和国反政府组织间的冲突正逐渐扩大。2019 年 2 月, 中非共和国政府与 14 个反政府组织签署和平协议, 但是政府仅控制该国 1/3 的领土, 其余领土的控制权由数百个武装组织相互争夺。2019 年 9 月, 中非共和国反叛武装中非复兴人民阵线 (Front populaire pour la renaissance de la Centrafrique, FPRC) 与中非争取正义解放者运动 (the Movement of Central African Liberators for Justice, MLCJ) 反目, 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势力范围争夺。中非复兴人民阵线还与中非复兴爱国联盟 (Rassemblement Patriotique pour le Renouveau de la Centrafrique, RPRC) 在恩德莱 (N’Délé) 地区爆发激烈战斗, 最终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夺取该城市。此后, 中非复兴爱国联盟与中非争取正义解放者运动联手袭击恩德莱, 造成 37 名平民死亡。^① 持续了两年的中非共和国反政府组织混战造成许多战斗人员和平民死亡。

综合来看 3 种非洲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发展情况。首先, 尽管近年来非洲地区开展了多场高强度的多边反恐行动, 也摧毁了很多恐怖组织的基地和据点, 但总体上看, 因恐怖袭击导致的平民死亡数量还在增加, 非洲的反恐局势正变得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非洲本土武装宣誓效忠“伊斯兰国”, 使本土武装间关系、国际恐怖组织间关系缠绕交织, 增加了未来恐怖组织发展态势的不确定性。因此, 未来一段时间, 恐怖主义组织特别是“伊斯兰国”在非洲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其次, 近年来非洲民族冲突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人员死亡, 总体趋势平稳, 但是尼日利亚、苏丹的民族冲突有扩大趋势, 需要特别关注。再次, 总体上, 近年来反政府组织间的冲突烈度较低, 但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与中非争取正义解放者运动间的冲突需要给予关注, 防止继续发酵。

(三) 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

间接暴力具有隐性特征, 很难通过量化的方法判断其发展趋势。因此, 笔者

① “Political Geography Now,” <https://www.polgeonow.com/2021/07/who - controls - the - central - african - republic - 2021. html>, accessed March 10, 2023.

收集了近一年内关于非洲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并依据这些材料分析当下非洲可能存在的间接暴力趋势。

第一，部分地区冲突后的次生暴力。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冲突后的次生暴力对人民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尽管埃塞俄比亚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已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仍有大量难民流离失所，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及保护。据统计，2022年8月至今已有10万多埃塞俄比亚人丧失家园，并面临严重的医疗、教育、水资源短缺。^①在提格雷地区，约有37%的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其中有4%为重度营养不良。中非共和国长期内战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多年冲突和不稳定摧毁了政府机构和基础设施，使数百万人无法获得清洁水、医疗保健和食物，还导致约110万人无家可归。1/3的儿童无法接受教育，其中有1.4万名儿童被招募为童子军。此类暴力还存在于刚果（金）、乍得等战乱地区，一些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已对此积极干预，力图减轻次生暴力带来的进一步伤亡。

第二，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间接暴力。在非洲国家，一些职业的薪资待遇非常低，比如安哥拉警察的住房条件较为恶劣，数千名警察被迫住在建于殖民时期的军营里，还有部分警察居住在用厕所改装的宿舍中。^②再如，1999年以来，尼日利亚教师因工资待遇低已经举行了17次大罢工，最近一次大罢工始于2022年2月。此次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尼日利亚学校基础设施极为破旧，教师薪水和科研经费短缺严重，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计划建立63所新大学以彰显政绩。尼日利亚教师提出停止罢工的条件是，重新谈判关于教师工作条件的协议，拨付大学振兴基金，解决教师工资差异问题，资助州立大学。^③

第三，大量移民没有身份证明带来间接暴力。在利比里亚，很多第二代难民没有出生证明，这让他们变成无国籍者。依照法律，没有国籍的人不能接受教育，也不能办理护照。在南非，宪法规定每个儿童从出生起就有权获得姓名和国籍，但许多移民南非的莫桑比克人无法办理身份证。这导致很多人尽管考取了大学，也无法攻读大学学位。

（四）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

社会性歧视是当前非洲面临的最普遍的暴力形式之一。社会性歧视是指针对某一

①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Ethiopia Situation Report," <https://reports.unocha.org/en/country/ethiopia/>, accessed March 15, 2023.

② Edna Namara, "Lawsuit Targets Police Officer's Shoddy Housing,"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2210130435.html>, accessed March 15, 2023.

③ "Is There an End to Nigeria's Endless Lecturer Strikes?" <https://allafrica.com/view/group/main/main/id/00083429.html>, accessed March 15, 2023.

特殊社会群体的不公平、不合理、排斥性的社会行为或制度安排。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个人或某一群体针对某类人的社会性歧视属于无国家参与的暴力。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性歧视的施暴者可能是国家，属于有国家参与的暴力。社会性歧视的施暴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卢旺达大屠杀就属于社会性歧视中的直接暴力；个别非洲学校禁止残疾人入学就属于社会性歧视中的间接暴力。本节主要探讨非洲社会性歧视中的间接暴力行为，包括女性歧视、残疾人歧视等。

在一些非洲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她们正遭遇着系统性的社会暴力。首先，非洲女性普遍早婚早育，甚至在其未成年时就被要求嫁人。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沙漠之花》就介绍了索马里黑人模特华莉丝·迪里在 12 岁时被迫嫁给一名 60 岁的男子。虽然该事件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是强迫女童早婚早育的情况在非洲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据人口基金组织统计，2011—2016 年纳米比亚共发生 5400 起童婚，有 3.6% 的母亲小于 15 岁。^① 2021 年马拉维曼戈奇地区有超过一半的女孩在 18 岁以前结婚。^② 其次，早婚早育剥夺了大多数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很多年轻的妈妈想要回到学校继续读书，但大多被其父母、丈夫以女性不需要教育为由阻拦。^③ 在一些冲突地区，接受教育对女性来说更是奢望。由于西部地区分离主义冲突以及博科圣地恐怖主义袭击，喀麦隆已有近 100 万儿童辍学，特别是女孩被恐怖分子要求禁止上学。^④ 最后，割礼夺走了很多年轻女性的幸福甚至是生命。在索马里、苏丹等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国家，女性割礼的现象较为普遍。割礼是男性统治下的女性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女孩子们之所以要经受这种巨大痛苦多数是被迫的，是出自男人对女子贞节的需要。^⑤ 割礼手术既摧残了女性的性功能，又危害了她们的健康。这一习俗至今还在非洲地区流行，但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关注该问题，已有非洲国家立法禁止割礼行为。

在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西非国家，残疾人受歧视现象较为严重。残疾儿童会被赶出公立普通学校，并被迫转入特殊学校。他们不但无法上学，而且很难生存下来。因为残疾被视为“上帝的惩罚”，所以他们经常遭到歧视和辱骂。虽然

① The United Nations, “5400 Child Marriages in Namibia since 2011,” <https://esaro.unfpa.org/en/video/5400-child-marriages-namibia-2011-according-un>, accessed March 20, 2023.

② The United Nations, “Keeping Girls in School—Malawi,” <https://esaro.unfpa.org/en/video/keeping-girls-school-malawi>, accessed March 20, 2023.

③ Merveille Kavira, “Once Barred From School, Woman Embrace Education,” <https://globalpressjournal.com/africa/democratic-republic-of-congo/historically-barred-school-women-embrace-adult-education/>, accessed March 20, 2023.

④ Moki Edwin Kindzeka, “Cameroon Girls Call for End to School Shutdowns,”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2210120076.html>, accessed March 20, 2023.

⑤ 李金莲、朱和双：《女性割礼：妇女人权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悖论》，《思想战线》2007 年第 1 期，第 114 页。

西非各国都承诺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等联合国条约，但是残疾儿童的权利仍不被非洲各国重视。^①

除社会歧视外，弱国家现象也会导致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一些非洲国家治理能力羸弱，法律和社会秩序失效，致使违法犯罪活动猖獗，但是政府对此无能为力。比如，非法贸易是非洲广泛存在的间接暴力之一。非洲每年因非法捕捞活动而损失约 112 亿美元的收入，^② 石油黑市和假冒产品为恐怖组织进行非法活动提供了资金和资源，伪造的药物致使许多人死亡。^③ 在过去十年中，象牙升值导致东非大象数量减少了近 50%。^④ 南非颁布烟草销售禁令期间，非法贸易犯罪迅速上升。^⑤ 由非法贸易导致的间接暴力在非洲有增无减。

结 论

基于有无国家参与、直接—间接暴力两个维度建立的非洲二维安全观，基本上可以比较全面地描述大部分非洲安全问题，弥补了现有安全理论对安全问题进行分类时模糊、交织的缺陷，通过非洲二维安全观分析非洲近年来的安全问题及趋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非洲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发展情况有 3 种，即暴力水平提升、暴力水平下降以及平稳发展。暴力水平提升的事件大致为 3 类。一是国家与恐怖组织间冲突导致死亡人数增幅较大，特别是与“伊斯兰国”“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间的冲突最为激烈。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分离主义武装间的冲突集中爆发于提格雷地区和卡宾达地区。目前，埃塞俄比亚与提人阵之间已经实现停火，而安哥拉政府与卡宾达飞地解放阵线—蒂亚戈·恩齐塔派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三是政府与反对派武装间暴力主要爆发于刚果（金）、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其中刚果（金）、乍得都已取得一定的和平进展，而中非共和国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暴力水平明显下降的国家

① Davinder Kumar, “Africa’s Disabled Cursed by Apathy and Abuse,”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13/9/23/africas-disabled-cursed-by-apaty-and-abuse>, accessed March 23, 2023.

② Michel Nkurunziza, “Developing Countries Lose U. S. \$11 Billion Annually Through Illegal Fishing,”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2211100123.html>, accessed March 23, 2023.

③ ALEX, “Illicit Trade Draining African Economics,” <https://theexchange.africa/industry-and-trade/illicit-trade-draining-african-economics/>, accessed March 23, 2023.

④ Obrian Gutu, “How Africa Loses Millions Through Illicit Ivory Trade,” <https://www.africanexponent.com/post/18233-how-africa-loses-millions-through-illicit-ivory-trade>, accessed March 25, 2023.

⑤ “Illicit Trade Surges in South Africa,” <https://tobaccoreporter.com/2022/04/06/illicit-trade-surges-in-south-africa/>, accessed March 25, 2023.

为利比亚、埃及和苏丹，但这 3 个国家未来依然有可能再次爆发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特别是苏丹和利比亚，由于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分歧依然存在，很可能再次将政府卷入冲突之中。2019—2021 年索马里暴力水平发展平稳，但随着 2022 年大规模反恐行动的开展，此类暴力程度有显著提高。

第二，在非洲，相较于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造成的平民死亡数量最多，其中恐怖组织是最主要的暴力来源。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本土恐怖组织效忠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非洲地区与全球恐怖主义发展态势相关联，既激化了非洲地区恐怖组织间的竞争，又增加了恐怖袭击的范围与次数，而这些恐怖行为严重威胁着平民的生命安全。此外，苏丹和尼日利亚民族冲突、中非共和国反政府组织间的冲突都有逐渐升级的趋势，需要给予关注。

第三，非洲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中，部分地区冲突后的次生暴力最值得关注，比如提格雷、刚果（金）东部、乍得等。此外，由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配制度造成的一些职业薪资水平低以及大量无国籍难民问题需要妥善解决。

第四，非洲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中，社会性歧视比较普遍。歧视残疾人、白化病患者、女性等群体的新闻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解决好此类问题不仅有利于提升国民整体生活水平，还有利于体现国家治理能力，塑造良好形象。未来非洲国家需提升治理能力与意识，避免无政府参与的暴力事件发生。

非洲各国应合理利用直接暴力实现地区和平，即通过武力达到止暴治乱、维护政治稳定的目的。比如近年来布基纳法索、马里等萨赫勒地区国家发起的反恐行动，刚果（金）政府对 M23 反叛组织等的打击，都是政府积极维护地区稳定和政治统治的行动。这一方式取得一定的成效，大幅削弱了萨赫勒地区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M23 反叛组织等的武装力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地区安全局势。但是，直接暴力并不能从根本上长效地解决国家或地区安全问题。在西非多国的反恐行动下，“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基本丧失了大规模袭击的能力，却日益加强与“伊斯兰国”的联系，于 2019 年 5 月成为“伊斯兰国”西非省的独立分支，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① 美国自索马里撤军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反恐力度减小，索马里“青年党”再度活跃，在 2022 年袭击数量增加了 26%。^② 刚果（金）政府军平叛东部反叛武装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以及数

① ACLED, “The Islamic State Sahel Province,” <https://acleddata.com/2023/01/13/actor-profile-the-islamic-state-sahel-province/>, 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13 日。

② “Al Shabaab Attacks Increased by 26pc in 2022,” Capital News, <https://www.capitalfm.co.ke/news/2023/02/al-shabaab-attacks-increased-by-26pc-in-2022-chrisps-report/>, 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13 日。

十万人流离失所，滋生出新的更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灾难。^① 因此，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虽然可能带来短暂的和平，但是如果过度使用或者不当使用，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大更持久的挑战。

在运用直接暴力的同时，应注意解决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以利于地区安全的长效治理。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是由国家实施的非武装暴力行为，其目的或是维护政府统治，或是实现国家利益。就前者而言，政府制定有利于其继续统治的制度或法律，以削弱反对者实力或限制其行动。就后者而言，国家大多利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对他国施加间接暴力，以达到影响他国行为的效果。两者都有可能激化甚至滋生直接暴力。比如，卢旺达独立之初，无论是胡图族还是图西族执政，政府都极力渲染民族仇恨，对另一民族施加多方面的歧视政策。作为国家实施的间接暴力行为，这些歧视政策加深了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裂痕和仇恨，并最终酿成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事件。在大屠杀发生后，扎伊尔蒙博托政府向胡图族流亡政府资助了价值 500 万美元的武器，并鼓励其对抗卢旺达图西族政权。^② 蒙博托政权支持胡图族流亡政府的目的是帮助胡图族反攻卢旺达，推翻图西族统治，属于针对卢旺达的间接暴力，这一行为直接促成了 1996 年 10 月卢旺达军队入侵扎伊尔。因此，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往往相互联系，对国家和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无国家参与的暴力是“弱国家”现象的表现，解决非洲“弱国家”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公共行政和制度的设计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二是由国际社会合作促进“弱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③ 具体而言，针对社会性歧视问题，非洲国家需要通过多种政策、措施、手段，营造良好的社会条件，提倡社会平等，反对社会性歧视思想和行为，如禁止以性别身份来确定工作与劳动的不同待遇，严禁同工不同酬等。针对日益猖獗的非法贸易、跨境犯罪问题，非洲国家在加大监管范围、加强执法力度的同时，还应将合作打击跨境走私犯罪纳入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合作中。此外，还可以依托世界海关组织的海关执法网络沟通平台和国际刑警的全天候通信系统，及时分享信息情报，推动新型专业调查技术应用，强化打击意愿和执法能力，提升打击跨境犯罪的能力。

（责任编辑：陈雅慧）

① 《刚果（金）：东部暴力升级致数百人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网站，<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1/1114477>，访问时间：2023 年 2 月 24 日。

② [美] 贾森·斯特恩斯：《刚果战争——失败的利维坦与被遗忘的非洲大战》，郭丹杰、吕赛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91 页。

③ 同上。

Shaping the Governance Agenda of Climate Security : African Union ’ s Progress and Dilemmas

Zhou Yijiang

Abstract :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climate security governance agenda in the context of insufficient momentum for global climate cooperation and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limate security threats. The negative impact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pose serious threats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Africa. As the most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Africa, the African Union undertakes the mission of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peace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It has carried out the discourse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xploration concerning climate security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endeavoring to improving the visibility of Africa ’ s climate security issue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meanwhile, cooperating with the EU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o enhance Africa ’ s capability to deal with climate risks. However, due to differences in positions among member states and insufficient internal coordination and resources, the process of the AU ’ s participation in climate security governance still faces a host of obstacles. China and the AU can maintain policy dialogue and deepen climate cooperation under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work together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moting sustainable security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 African Union ; climate security governance ; climate strategy ;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uthor : Zhou Yijiang, Assistant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frica ’ s Two – dimensional Security View

Zhu Weidong and Luo Ziheng

Abstract : The vast majority of existing studies describe African security issues as “ various types of security issues intertwined ”, which blur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security issues and neglect the typological research on African secur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new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for African security issues by inheriting and improving existing security theories. Based on the two –

dimensional African security perspective of state/non – state participation and direct/indirect violence, African security issu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direct violence with state participation, direct violence without state participation, indirect violence with state participation, and indirect violence without state participation. Using the two – dimensional security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Africa in recent years, it was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violence between African countries and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local separatist armed forces, and opposition armed forces in direct violence involving countrie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mong them, conflicts with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have caus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with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eaths; The direct violence without state participation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civilian deaths, with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being the main source of violence; Among the indirect violence involving countries, the most noteworthy is conflict induced violence, which mainly occur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e Tigray region, and Chad.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issues, African countri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addressing indirect violence with state participation while making rational use of direct violence, and actively implement policies to change the “weak country” status, minimizing incidents of violence without state participation.

Keywords: African security; two – dimensional safety perspective; 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y;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y; direct violence theory; indirect violence theory

Authors: Zhu Weidong,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 Luo Ziheng,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n Analysis of Sahel Terro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 Added Theory : A Case Study of Tillabéri Region of Niger

Qi Zhaoyuan and Xu Jiax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central Sahel has deteriorated, the Tillabéri region in northwestern Niger has been affected by terrorist forces. Since 2018, the region has seen a high number of terrorist attacks,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damage. The radicalization of terrorism in the Tillabéri region i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such as weak governance, conflicts between farmers and herders and intercommunal violence.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Tillabéri requires not only the cooperation of Nigerien and international military